



天津中西医结合发展史研究*

乔晨曦, 梁丽金, 李雪纯, 白育红, 司梦鸽, 赵 健[△]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301600

[摘要] 通过系统梳理天津中西医结合史的研究文献, 依照时代特点划分发展阶段, 分析其影响因素, 认为天津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可分为萌芽、初创、停滞、恢复等阶段, 受地理位置、政策方针、对外交流、学者创新等因素影响。且该地区当充分利用原有基础, 抓住机遇充分发展, 其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优势。

[关键词] 天津; 中西医结合; 医学史; 衷中参西

[中图分类号] R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600(2021)04-0064-04

Research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History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ianjin

QIAO Chenxi, LIANG Lijin, LI Xuechun, BAI Yuhong, SI Mengge, ZHAO Ji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1600, China

Abstract By systematically collecti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ianjin, the development stage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o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ianjin can be divided into germination, start-up, stagnation, recovery and other stages, affected by the factors of geographical position, policies, foreign exchange, scholar innovation and others. When the original foundation is fully utilized and the opportunity is fully developed in the di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local advantages.

Keywords Tianji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istory of medicine; consulting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1 引言

天津因漕运而兴起, 于明朝设卫, 有“河海要冲”和“畿辅门户”之称, 是我国最早开放并接触西方医学的沿海城市之一。天津地区对西医的应对与融合可视为中国中西医学汇通的缩影, 在中西医结合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学体系。其中, 衷中参西的思想基础、国家的大力扶持、医家的积极探索等因素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 但目前相关医学史研究尚不完善。笔者简述天津中西医结合发展史及其研究现状, 探究归纳其发展的促进因素及地方特色, 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2 天津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

2.1 萌芽阶段——西学东渐, 交融汇通 西医传入中国始于西方现代医学迅速发展和一系列传教、殖民活动, 天津中西医结合的起步有赖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及社会条件。明代末期欧洲经历了一

系列社会变革, 自然科学显著进步, 一批天主教徒来华传教并引入大量西方科学技术^[1], 这些人于1878年抵达天津。代表人物是马根济、郝维德等, 他们凭借显著的临床疗效逐渐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北洋施药局”建立。1880年首家完全由中国人兴建的西医医院“天津总督医院”成立, 1888年更名为“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医院”。但该时期公立西医医院极少, 外国医生在这一时期大多为私人开业看诊, 如X光大夫齐格来、妇产科大夫狄希那等。

西医需求的增加与人才的匮乏促进了西医教育在中国的兴起, 1893年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现代医学院校“北洋医学堂”成立, 由中法教师共同执教达37年; 同年, 第一所由政府出资成立的西医院校“天津总督医院附属医学馆”开学授课^[2]; 1902年袁世凯开设“北洋军医学堂”。因学校多坐落于租界内, 外国人多以免收房地产税为条件,

要求请外国教师授课并提供留学机会。随着西学东渐和医家的不断探索创新,中西医学汇通思潮逐渐兴盛。如被誉为“中国近代医学第一人”的汇通派医家张锡纯于1927年在天津行医授徒,创办国医函授学校、中西汇通医舍并自编教材。1934年,《国医正言》月刊由天津中医同仁公会发起人陈泽东创办,为中、西医理论研究与争鸣的重要战地。其后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烈性传染病流行,八年抗战期间天津人口出现明显的负增长。1947年全国八大城市中仅天津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医院亏损严重,医疗技术、设备与人才均相当匮乏。

至此,西医在天津初具规模,汇通思想开始萌芽,但中医仍占主导地位^[3]。传教士的医疗扶持一定程度上刺激并改变了天津的社会形态,其主要形式有兴办医院及医学院校、翻译西医书籍、创办西医刊物、开办药厂等。民国时期,在政府主要立场偏向西医的情况下,中医群体仿照西医发展模式以谋求中医的社会地位或被迫弃中学西^[4],故该时期中西医汇通的发展主要为思想理论的争鸣、医事制度的进步、中医西医及中西医并存医院的设立、中西医交流学社及报刊的设立等。但由于天津具有鲜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点,封建思想的束缚、政治局势的干扰加之科学技术的限制,这一时期中西医结合理论及临床尚十分单薄。

2.2 初创阶段——中西并举,开拓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市82%医院仍集中分布在旧时租界地区,落后的医疗环境无法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指引中西医结合的发展。1951年,天津应“中医科学化”的号召成立了中医进修学校,7期共培养了600余名中医医师;1956年开始举办学制2年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8期共培养主治医师以上的中西医结合人才430名,教学科目及学员人数不断增加,专家及学员编纂多部讲义、医案、论文、心得,涉及本草、内经、针灸等诸多领域;同年5月成立天津市中医学会^[5]。1953年政府拨出巨款兴建医院,1954年杨达夫、范权等专家放弃收入丰厚的个人诊所,积极响应党对于参加医院工作的号召。在周恩来总理制定科学研究“十二年规划(1956—1967)”的指导下,天津医疗专家承担54项课题并分配到各科室,极大地促进了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创新发展,如1964年尚天裕取得“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新疗法”重大科研成果等。1962年,中西医结合研究基地开始建设^[6],次年全国首个中西医结合医院

设立于南开医院,至1985年全市有中西医结合科研机构8所,占全市医药科研机构的24%。建国初期华北地区几度爆发流行病,如1957年甲型流感(H_2N_2)高峰、1958年伤寒高峰、1959年白喉高峰、1967年乙脑高峰等^[7],促使天津开展了一系列爱国卫生运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麻疹、痢疾、百日咳、脑膜炎、白喉等各种疫病相继成功,至1981多种传染病发病率均有所下降,其中乙脑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由天津公共卫生局向全国推广。同时,在中药现代化研究及工业发展的促进下,中药制药产业取得较大进展,如1954年我国首个中成药片剂“银翘解毒片”、首个中成药酏剂“藿香正气水”相继由天津隆顺榕药庄研制成功。

该时期天津中西医结合事业在全国已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部分以眼科、骨伤科为代表的优势学科理论体系逐渐完善,相关研究著述较前增加,但仍不系统、不全面。

2.3 发展阶段——抓住机遇,整合发展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党和卫生部的支持下,医疗领域思想建设、医院整顿、人才培养等工作恢复有序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重新起步并相继取得突破。上世纪八十年代,天津的中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研究颇有建树。吴咸中创建了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方先之成立了全国首个中西医结合治疗骨科研究所、王今达建立了全国首个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研究所^[8]、何世英成立了全国首个中医脑病科^[9]、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各专业委员会相继成立,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一五”到“六五”期间,天津医院、医生、医疗设备、就诊人数呈数十倍的增长,形成了由大型综合医院、普通医院、街道卫生院及保健站组成的“三级医疗网”,细胞分光光度计、元素自动分析仪等精密仪器大量引入,为医学事业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在周恩来总理“公字当头”的指示下,学科教育建设不断跟进,1970年起,南开医院连续举办9期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学习班;1980年起,天津医院连续举办36期骨科医生进修班。该时期天津中西医结合多个学科研究在国内较为领先并高速发展,“六五”期间全市科研成果165项,“七五”期间437项成果通过鉴定,如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确定为中国五项世界领先医学项目之一、1984年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阑尾炎“阑尾三片”获卫生部一级成果奖^[10-11]。1980—1989年共召开13次国

际学术会议,会上天津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感染性休克等成果受到瞩目,提高了国际影响力。1998年,天津市“中西医结合研究院”正式揭牌。

近二十年来,天津中西医结合仍在不断开拓创新、融汇贯通,在学科研究逐渐深入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现代学科交叉的探索。如“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治疗心血管疾病有效方剂组分配伍规律研究”973计划项目等相继取得重大成果,天津中西医结合事业在国内始终保持较为先进的水平。

3 天津中西医结合事业时代发展特点

天津作为全国的缩影,其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特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天津早期医家传记散见于各地方志中,最早有明确记载且无神话色彩者为窦默(公元1195年—1280年)。清末及民国时期,天津医家主要来自畿辅地区及北平,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后华北协和医院被迫关闭,一批专家陆续来津开业,后成为组建天津医学院及各医院的主干力量,如朱宪彝、张纪正、柯应夔等。由于社会动荡、卫生条件差、人口流动量大、医疗机构设置不足^[12]、靠近人口密集的北京等因素,骨伤、痈疽、瘟疫等疾病发生率较高,该时期涌现出一批以济世利民为己任的医家,如长于外科的刘济川、善治痈疽的高思敬、专攻瘟疫的洪天锡等;同时形成了以苏氏正骨世家为代表的骨外科体系,其传人苏绍三曾与方先之合作开展小夹板治疗骨伤科疾病的研究,启蒙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伤科领域。医家对于西学东渐分为守旧派、革新派、汇通派等立场,张锡纯率先在中西医汇通方面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其后丁国瑞、哈振纲等医家从临床对中西医结合加以应用,加之金韵梅、伍连德等海外医科大学毕业生归国,一批西医医院、医学院建立并投入使用,天津中医师公会等医学研习所及《国医正言》等医学期刊创立^[13],中西医结合在天津初具雏形,但是全市呈现“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不合理局面。同时受清末政治黑暗仕途无望、一系列救亡图存战争、缺医少药的卫生环境、废止中医案的刺激等影响,从事医学的人数激增。

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环境较之前稳定,西医教学规模扩大、留学归国人才增多使得天津地区医学现代化实验研究开始起步,一系列教材的编写及西方教学方式的融合使官办医学教育更易培养出汇通型人才。医学生的培养逐渐从家传、师承为主转变为院校教育,但尚未成为主流。具有

留学背景并作出杰出贡献的医家明显增多,如沈鸿翔、丁懋英等,为中西医结合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世医、流派传承等传统中医仍受民众认可,且针灸学科较为突出,如于伯皋、华佩文等,其原因有针灸不受药材资源限制、在某些病种较西医有明显优势且价格低廉等。一批德才兼备的老专家团结起来参与医院工作,为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医疗体系建设的开展贡献力量。由于社会阶级观念改变,医生地位明显提高,医生参政进一步促进了医学体制的进步,进而使公共卫生事业更适应社会需求,如政协委员朱世英、人大代表毛羽鸿等。

此后,一系列促进医学发展的文件出台、“西医学习中医”班的连续开展、工业现代化促进药剂工艺创新、大量人才及先进理论引入,实验研究由倚靠西医人才转变为自主探索。医疗、科研队伍相对独立使中西医结合上升到新的阶段^[14],研究院及学术团体的建立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学的发展与交流,综合国力的恢复使得医学研究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国际交流合作的建立为医家接受海外教育创造了条件,较早一批同时接受西医和中医院校教育的医家走上临床。新型中西医学教育及科研模式促使医家不断开拓创新,学科研究由相对封闭的独家研究转变为较为开放的联合攻关^[15],医学教育主流由家传、师承转变为院校教育,专科研究逐渐增多并成立诸多专科医院,人才评价模式及评奖评优更加具体化、国际化,均促进了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此外,大量从各地迁入天津的医家各具学术特色,形成了天津多样化的医学发展体系,例如江苏籍医家引入了“吴门医派”“孟河医派”等医学思想^[16]。由于理论观念、思维习惯、实践方法的差异,中西医结合早期依照其各自的范式相对独立地发展^[17],但随着医事制度、研究方法、临床实践、社会认同与观念的进步,当今中西医结合互为补充,继承了古代和现代医学的优势特征,为解决疑难病提出了新的途径^[18],正逐渐被世界所接受。

4 结语

现代著名中医学家萧龙友先生认为“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研此道者,不可为古人囿,不可为今人欺,或道或术,当求其本”^[19]。天津中西医结合史具有特定的地方特色,又交融汇通。独特的地理位置、西方传教士医学活动、有志之士的积极汇通、政策的指导与落实、学者的不断开拓创新是天津中西医结合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



《救荒本草》的历史成就及海外传播考略*

范延妮

山东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5

[摘要]《救荒本草》成书于明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救荒为宗旨的植物学著作。它东传日本,西传欧美后对该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救荒本草》的作者、体例、内容、绘图等谈起,探究该书对日本及欧美地区植物学发展的影响及其社会价值。

[关键词]《救荒本草》;植物学成就;翻译;传播

[中图分类号] R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600(2021)04-0067-04

On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Materia Medica for Famine Relief* and Its Overseas Spread

FAN Yanni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Abstract *Materia Medica for Famine Relief* is the first botanical work with the purpose of saving famine in the Ming Dynasty. After it spread to Japan in the East and Europe and America in the west, it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region. Starting from the author, style, content, drawing and so on, the influence of this book on the

素,缺一不可。故在医学的发展中应结合当地气候、药材、发病、生活习惯、流派等基本情况,发扬时空优势,在特定环境下形成具有特色的医学体系。其他地区的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可与天津互为参考,取长补短,以取得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 [1] 赵璞珊. 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J]. 历史研究, 1980, 27(3): 37-48.
- [2] 刘祺. 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1840-1911)医术、文化与制度的变迁[D]. 天津:南开大学, 2012.
- [3] 谢敬. 近代天津的中西医交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9, 39(9): 1116-1118.
- [4] 余新忠, 王沛珊. 科学化·专业化·国学化——晚清以来现代中医的生成[J]. 文化纵横, 2017, 1(3): 108-116.
- [5] 贾鸽. 交流与融合——建国初期天津中西医结合问题研究[J]. 世纪桥, 2015, 29(10): 87.
- [6] 张伯礼, 于铁成. 天津中医史略与学术思想[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308.
- [7] 张荣庆, 张幼琳. 天津市1949-1985年疫情年表[J]. 天津卫生史料, 1986(4): 54-57.
- [8] 史宇广. 中国中医机构志[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9: 50.
- [9] 郭凤岐. 天津通志·卫生志[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507.
- [10] 王兴民. 天津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临床(急腹症)学科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点[J].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0, 10(4): 193.
- [11] 尹力, 胡国臣. 中国卫生年鉴1996[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 111-115.

- [12] 杨木锐, 陈柳, 韩赫宇, 等. 《大公报》载民国天津疫病救治文本研究[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34(2): 394-397.
- [13] 杨木锐, 王森, 秦玉龙, 等. 民国时期天津地区中医学术团体研究[J]. 西部中医药, 2019, 32(2): 60-62.
- [14] 王振瑞, 李经纬, 陈可冀. 20世纪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史学考察[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5, 25(11): 1033-1037.
- [15]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M]. 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1998: 8.
- [16] 谢敬. 民国时期寓居津门的江苏籍医家考[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1): 39-42.
- [17] 孙超. 中西医交流史研究中的一点启示[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4(1): 6-9.
- [18] KEJI CHEN. My 60 yea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tegr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2016, 22(8): 563-568.
- [19] 肖承惊. 回忆肖龙友先生[J].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1981, 5(2): 20-25.

收稿日期: 2020-10-29

*基金项目: 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2018-ZD-09-06);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九届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CXJJ2019ZG03); 天津市202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TJYQN20-003)。

作者简介: 乔晨曦(1998—), 女, 本科在读。研究方向: 中医医史文献。

△通讯作者: 赵健(1985—), 男, 博士学位, 讲师。研究方向: 中医医史文献。